



文学评论要拒绝“套路”“黑话”

□李壮

鲁迅在《墓碣文》一篇里曾有过“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之语。作为一个从事文学批评写作的人，我常会想到鲁迅的这一说法。这段时间，文学界在热议当下中国文学的发展和问题，许多人提到，文学批评应当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真正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褒优贬劣，激浊扬清”。这背后透出的问题并不新鲜：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批评太少而赞美太多，真话太少而套路太多，在“有效性”上出现了不少问题。我相信，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我们应该很快能看到一批问题针对性鲜明、富有批判锋芒的评论文章。但另一方面我也在想，当我们面向外部展开批评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把刀锋切向自己，沉下心来反思一下文学批评内部出现的问题？文学批评的写作者们，能否也试着“抉心自食”，求其本味，亦即重新唤醒文学批评的“初心”？

批评本身也是写作之一种，我们既然能够围绕文学作品熟练地展开文本细读，那么也不妨以同样的方式剖析一下我们自己的批评写作。许多问题将在这过程中浮现出来，例如，当下的许多文学评论文章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春秋笔法”式的写作套路——它们在涉及褒贬评价的时候，往往遮遮掩掩、东拉西扯、象征暗示，就是不敢明明白白地把真实意见讲出来。

所谓“春秋笔法”，更具体的说法即“微言大义”、“一字春秋”。落笔时一字之差便能见出褒贬、暗示态度，这是中国古代史书撰写中常用的方法技巧。试举一例，《春秋》原文中有“郑伯克段于鄢”之句，《春秋左氏传》对此句的用字有专门的解析：“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意思是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谋反，违逆了兄弟之道，所以不以“弟”字称呼他；庄公与共叔段像两个国君那样互相攻打，所以称“克”；将“郑庄公”降格为“郑伯”称呼，则是讥讽他对弟弟失于教诲。这样的处理方式出现在史书之中，我们今天配着解析注释读来，似乎别有一番趣味；然而类似的笔法若大量出现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之中，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史书的首要功能是记录事实，倘若还有史家自己的立场“一字春秋”地藏在文本背后，那其实是构成了额外的惊喜；而文学评论的本质则是表达态度、亮明褒贬，如果连这态度都还需要读者去揣测、猜想甚至对照着注释参悟玄机，那就不属于惊喜而属于失望了。

我们今天的情况是，说好话赞美别人的评论文章很少“失职”，优点说起来一二三四清楚明白，先不论文章本身写得漂不漂亮、有没有新意，远观总归是一派花团锦簇之景。出问题的大都是那些想批评又不好意思批评的文章，“春秋笔法”在这种情境下频繁地出现：别人约我写篇评论，总不能全说人家的坏话吧？还是要肯定为主。但细细读完，发现作品实在是写得不好，挠头纠结半天，只好先“王顾左右而言他”。这篇小说写的是什么主题？赶紧把脑中古今中外文学名篇都翻找一遍，下笔将相关主题的演变谱系梳理一番，最后留一句话落回到手头的作品：“如今，这篇小说又为某某主题的文学长廊增添了新的形象”。接着再往下走——这篇作品使用的语言是什么风格？民间一点的叫“表情丰富充满活力”、学院风格的说“长于刻画复杂经验”。人物关系是什么结构？一个人贯穿全场叫“独语的魅力”，两个人分分合合可以谈“自我与他者”，三人以上扯不清楚那就是“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处境”。搬出几个西方大理论家的名字，用那套驾轻就熟的理论话语阐释装点一下，看看文章字数，差不多能够交差了。但通篇没说过几句有实际意义的话，甚至连像样的文本分析都没有，全程都是在躲着文本说空话，这终究有点良心不安。因此犹豫再三还是在文末留下这么一截遮遮掩掩的“真话”的尾巴：“某某的这篇小说，虽然在某某方面、某某角度还存在较明显的提升空间，但总体看来，依然不失为是一篇较能够打动读者的作品。”

“虽然但是”、“较明显的提升空间”、“总体看来”、“仍不失为”、“较能打动”……太多的玄机和顾虑，令这些句子显得不堪重负，疲倦且荒唐如一个出门远足的人穿反了两脚的鞋子。在一般读者看来，这似乎是一句肯定性的对话；但更为专业的人显然能够破译其真实的内涵，那就是：这篇小说实在写得不太行，真要让我说什么，恐怕也就只剩那点儿真情实感可以夸夸了。这样的套路并不夸张，“顾左右而言他”的思路也绝非想象，因为我以上所写，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我自己的“病历”。我愿意拿自己开刀，当我出于种种原因、偶尔写下这类“仍不失为”式的句子，我都会在内心感到痛苦：我知道身边许多人都在这样做，但我终究不甘心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员，我清楚这样的“套路”对文

学评论的有效性存在巨大的杀伤力。将这种套路称为“春秋笔法”，事实上已经是极其文雅的说法；讲得更直接一些，这类文章其实是建构了一种业内的“黑话”，只有圈内人才能真正读懂。如果有一天，文学评论完全堕落为内部流通的“黑话”、“暗语”，那么它的意义也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文学评论里的“春秋笔法”，看似皆大欢喜，其实却是对读者和作者的双重不负责。虚假的赞美会令真诚的赞美蒙羞、轻妄的判断会使认真的判断失效。

文学评论里的“春秋笔法”，看似皆大欢喜，其实却是对读者和作者的双重不负责。虚假的赞美会令真诚的赞美蒙羞、轻妄的判断会使认真的判断失效。

讲得更直接一些，这类文章其实是建构了一种业内的“黑话”，只有圈内人才能真正读懂。如果有一天，文学评论完全堕落为内部流通的“黑话”、“暗语”，那么它的意义也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真话和良心不能缺席。文学评论需要的不是遮遮掩掩的“春秋笔法”，而是有的放矢、有一说一、一针见血。

“错批”，而是“无批”甚至“错捧”。从纯粹的文学史学术层面看，“错批”造成的遗憾确乎不少；在文学生态乃至世道人心的角度讲，“无批”和“错捧”的危害其实更大。前者无非是遮蔽，后者却是在败坏。

伍尔夫对乔伊斯、纳博科夫对康拉德、卡波蒂对凯鲁亚克、海明威与福克纳彼此之间，都曾有过严厉甚至刻薄的批评言辞。如今，其中命中要害之语已被我们奉为经典，至于失之偏颇的观点，也大多作为名人轶事一笑而过。我们所提出的观点，得下的结论难免会有失准的时候，但这并非是无法弥补的过错，因为不论将等待多久，时间与人心总会把最终的判决书送抵于一切判断者与被判断者的面前。真正难以承担的，是“故意失准”对文学造成的伤害。用所谓“被破坏的赞扬”去赞美那些明显配不上赞美的文本，对真正的好作品是巨大的

不公；虚与委蛇固然是代价小而收获大的讨巧做法，但长远来看，文学批评的尊严和公信力将因此遭受不可逆的损失。判断失准和有意违心终究是完全不同的事，前者仅关乎能力水平，后者却涉及职业道德。我们总是说今天的文学评论工作还有待提高，这样那样的问题都需要解决……其实在我看，这之中最致命的短板，还真不是专业能力的不足，而是职业道德的缺失。

文学评论中的“春秋笔法”虽然只是“小花招”，但若不以为意、甚至对此理直气壮，那么就很容易滑向职业道德的“大失节”。因此，作为一个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人，我会从自身的写作开始警觉，并对自己设下这样的期许：几十年后，当我在垂老的病榻前想起一生所下过的判断，我能接受自己为识见和才能上的局限而感到惭愧，但绝不希望自己因品德上的污迹而感到羞耻。

■新作快评 武歆短篇小说《一场撕心裂肺的出轨》

《天津文学》2016年11期

在历史和现实的天平上

□陈福民

在短篇小说《一场撕心裂肺的出轨》中，武歆向读者展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观察角度。小说只有三个人物：作为叙述者的“写诗的小克”、小克的姐夫老马及其夫人刘秀贞。小克显然并不具备“人物”的意义，他仅仅是作为一个功能性的角色，小说实际上就是在老马与刘秀贞之间展开故事的。

小说并没有太多的情节。一个普通的夜晚，老马发现自己的夫人刘秀贞在离家三小时后还没有回家，于是找到了内弟小克通报这个“失踪”消息，经过一夜的等待和半天的寻找，刘秀贞被发现在一家酒楼里点了一桌子饭菜，又无能力结账。小克和老马赶过去汇合、处理，平安无事。如此而已。

我推测，如果仅仅通过小说标题所示去期待文本，看到以上对小说的简介后，武歆说不定会遭到读者怒骂：骗子，说好的“撕心裂肺”呢？你宣扬的“出轨”呢？然而当我们仔细阅读了文本之后，一种难言的苦涩和创痛就会在什么地方击中我们的软肋，使我们恍然大悟：生活绝不仅仅如此而已。

武歆怀着一点点狡猾的“恶意”，嘲弄了读者的世俗期待。同时，小说的叙事能量，也远远达不到“撕心裂肺”的强度，那几乎是一个“无事的悲剧”。被生活定义为吝啬鬼的近乎奇葩的男主人公老马，加上一个夫唱妇随20年的无言者刘秀贞，是被生活彻底征服和击垮的人。他们半生凄苦，有愧于人伦亲情，丧失掉了朋友，就相当于退出了社会，几乎是作为孤立无援的自然人而苟活着。武歆试图告诉我们，他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我们的社会中，其实不乏这种单调倔强的生物性存在的，只是我们没有耐心去辨认他们而已，甚至我们尤其无法从他们身上认出自己的病灶。异类感和屈辱感是他们唯一跟这个社会连接的纽带，但这类人物只有遗忘掉异类感和屈辱感，才能寄生在社会中苟活下去。

莫泊桑的《项链》，同样是一个面对贫困、屈辱与绝望的故事。玛蒂尔德及其丈夫并未因为经济上的灾难而去寻找“吝啬异类感”的道德根据，从而将一切个人责任归结为一种想象的社会原因。莫泊桑峰回路转地告诉我们，他的作品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完全不值得，但他的人物并未因此丧失社会道德。的确，构成小说人物心理动机的社会元素，并不必然导向人物道德的放弃、崩溃与病态。

武歆显然了解这一点，于是他的作品开始“出轨”了！刘秀贞在夫唱妇随的20年内，屈服于老马的“吝啬异类感”，没有朋友，不认同同学，甚至弃绝人伦亲情。她辗转于非人的世界，挣扎在每一个铜板的节省中，时间对她没有了意义，只有一具生物般存在的躯壳。因此当她失踪后，老马完全无法知道发生在刘秀贞内心的惊涛骇浪。

下饭馆这件事，在今天已经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刘秀贞等这一刻等了太久，她是用了一生的时间来等待这一刻。当她石破天惊地出现在“壹号酒楼”的豪华包间内，面对满桌根本吃不掉的佳肴时，她的报复来得是何等痛快何等致命，而吝啬奇葩老马的世界瞬间坍塌，又是何等迅雷不及掩耳。行文至此，无论是作者武歆，还是亲爱的读者们，应该都体会到这一场撕心裂肺的“出轨”的酣畅淋漓绝非欺骗，那乃是我们都会经历和遭遇的人生风景。在我们的人生成长过程中，坠落还是升腾，从来都不是一个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它需要太多的警惕。

武歆的小说取材，往往着眼于平凡琐碎的边缘人生活，这使他的小说写作，或迷于一种生活的扭曲状态，或在小说中去强力扭曲和干涉生活逻辑，从而使他的小说创作在平稳清淡中与众不同。他的小说叙述，在平淡中始终追逐和保持着一种现实主义的心理深度。通过对那些非正轨的人生经验的把握与开掘，人性的秘密隐痛与尴尬奇诡跃然纸上，这是武歆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独到能力。

为避免现实主义全景式描写所带来的平铺直叙，武歆习惯于引入一个叙述人的角色，或者通过人物回叙、讲述的方式交代背景，以期产生某种奇峰突起的叙述效果。一般说来这都是很有成效的方法。但在某些时候，这种方式也会造成结构上的拖沓，语言上显得不够节制。这些都有待于武歆在未来的写作中去体会和克服。

■短评

重温丁捷《追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心绪复杂，感慨良多。

反腐败是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兴衰、政权存废的天大问题，也是天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之大、举措之严、对形势估计之严峻、扳倒大人物之众多引发社会震动。霹雳手段毅然决然，令人信心倍增，但也让人不免想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些所谓精英群体内部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裂变？他们有着怎样的成长轨迹心路历程？这一群体的内心深处最为幽微隐秘的暗角究竟蛰伏着怎样的秘密？在此大背景之下，正处壮年的丁捷既有职业的便利，更有作家的激情与良知，他卸掉成见，与这些人晤谈交流；查阅大量卷宗，消化融合，去粗取精，最终以口述实录的形式呈现出这样一部20余万字的呕心沥血之作。

这是一部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纪实文本。丁捷舍弃掉报告文学的枝节杂蔓，不为情节的惊悚人

典型样本的人生启示录

——丁捷《追问》读札

□雷雨

物、丰满的故事而费脑伤神。他直面这些人物，截取他们人生旅途中最为集中的软肋，不做先人为主的认为设定，不做居高临下的道德判断，不把他们当做鬼，而是把他们当做当下的“中国病人”来一一走近贴心梳理冷静审视。

这是一部情感浓烈、思考真切的现实备忘。腐败似乎人人痛恨，但似乎又有多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更难有切中肯綮的理性超越。丁捷的《追问》中的人物，有省管干部，有中管高官，地域遍布大江南北，行业涉及五行八作。丁捷以极大的精力、浓烈的感情对这些多被概念化、脸谱化、模式化的群体一一进行解剖。面对这些曾经的“成功人士”，作家不是故作高深地鄙夷不屑，不是肤浅廉价的翻案猎奇，而是力求深入地把他们的人生悲剧一一罗列，录以备忘。

这是一部没有悬念丛生的开放的病理诊断。这一特殊的群体，曾经是中国大地之上芸芸众生中的

“关键少数”，如今堪可称作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的“中国病人”。但对这样的一群“中国病人”，如何做出权威诊断，提供灵丹妙药？作者没有坠入这样的虚妄陷阱，他以文学的虔诚、作家的担当提供文本，启人思考，同时放平姿态，倾听而不盲从，理解而非曲解，各种诊断也都力避千篇一律、大而无当。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人也毕竟是另一种主体的存在。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可以复制的人生。丁捷的鞭挞拷问，贵在指出问题，引人思索。除了主体部分，本书的“亲历”、“印象”、“尾声”切不可当做闲笔而等闲视之，它们与整部书浑然一体，都是应该注意的不可错过的文字。

如此众多的人生就此身败名裂，如此众多的人生就此归零黯淡，怎能一言以蔽之？怎能停留在津津乐道、冷眼旁观的层面？《追问》以其勇气、敏感，更以其切合当下社会重大命题的独特文本价值，成为人们热烈争议的一部纪实力作。

《病房》：拆解在一根人性链条上的纷繁世界

□左马右各

经世经历，又让我发现一个可怕的却又实存也仍在继续蔓延的东西——一种隐存在社会中的无形的但却对人具有腐蚀力量的毒素正在横行。最为可怕的是，这个社会正在成批量地复制和制造这样的群体，这是一种无形却真切存在的惰性力量。唐慧娟无疑是对这个社会和她所经由的人生有过清醒认知的人，但我想说，或许正是这份过度清醒，让她失去了本应让内心葆有的某种珍贵品质。如果说她的悲情命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这个合理性不是作家刻意制造的，是社会发展的某种畸形时刻造成的必然结果。

谢有顺曾说：“小说的写作，有时不应是扩张性的，反而应是一种退守，退到一个自己有兴趣的地方，慢慢经营、研究、深入，从小处开出一个丰富的世界来。”在杨晓升的小说写作中我看到了这样的异变景象。从他近年发表的小说《介入》《身不由己》《日出日落》《天尽头》《风过无痕》《疤》等一系列作品中，我们已看到完成转身的作家形象。他看似是在回退，但却以新的写作实践经营着一个“从小处开出一个丰富的世界来”的创作愿景。

杨晓升说：“如何在作品中摆放现实是对成熟作家的一种艰难考验，这既考验作家处理现实的能力，也考验作家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对生活的认知。”《病房》这个小说为作家的言说做了最好的诠释。

杨晓升的中篇小说《病房》（云南“大益文学”书系第二辑《城》，漓江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中，内生于作家灵魂深处并不断腾升的创生原力，激荡在小说文本之内。小说以京城某家三甲医院的4号“病房”为文本切口，经由退休教师李建文中风入院这一引线，把一个反映医患生态具有批判意味的故事，通过精彩的叙事架构和人物浮雕式的凸显展示出来。

小说中的李建文古板、严苛，为当年王美丽失学一事耿介在心；遇到刘平民一家受困医药费的负担而陷入挣扎的绝境时，拿出自己的治病钱给予解危。这样一个人物，看着似具有某种善爱化身的影迹，但他又是一个迂腐的教书匠。在这个人物身上，既有人性光芒的磊落，也不乏人性失色的黯然时分。我觉得作家在面对这个人物时，内心也是矛盾的，因为他深知人性的复杂与乖违。

李建文和王美丽作为20年前的一对师生在医院意外相遇，王美丽在内心恨着李建文，恨这个当年葬送自己在花季年华求学前程的班主任老师。作家对这个人物的人性挖掘颇费心机。让她以一个负责任、深得病患家属信任的形象出场，但当师生巧遇发生，又迅速急转，让她变身成为一个自私的复仇者。王美丽也是一个病人。但她又是一个人性自愈机制尚未完全失控的病人。她虽无宗教信仰，但内

心有着像生养她的故土那般醇厚的不泯善愿，这已足够让她在滑向罪的渊薮时实现自我救赎。王美丽这个人物真正丰满起来，是在她发现2号床的病人刘平民的女儿刘彩霞为了使父亲得到更好的医治，不惜卖血筹款准备给主治医师送红包这一秘密之后。从她劝阻、制止刘彩霞继续卖血到勇敢地挺身而出，拦住高院长及市纠风办检查组一行人员，使这个身陷医贫陷阱的家庭再次获得挣扎出来的希望。可以说，至此王美丽这个人物已经获得擢升。当医院以及社会借此大肆宣传某种表象正义并忽略掉她这个发事者的时候，她并没感到失落，反而生出一种莫名的心安，仍“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护工工作”这才是她人性深处最为光辉的地方。作家挖掘到了，并使之占到一个隐存的人性高点上。

这时，再回观这个人物，就会发现她的报复具有某种典型的象征意味。她的这些看似是纯粹出于个人的泄愤行为，却有着为一个在人生底层挣扎的生存群体寻求某种宣泄的意味。但这无疑又是一个社会人夹杂着愚昧的蠢行。这种双面人格，也使得王美丽这个人物形象变得真实可信。

小说中还有一个女人引起我的多重思考，她就是唐慧娟。在这个小说中她是一个不无悲情的边缘人物，但从这个人物所透露出的成长、成熟和